增訂版序

[xi]

自 1980 年代末，余即有意爲 1976 年本書之初版撰寫第二版，然其完成所費時日，竟遠超當初所料。自 1987 至 2000 年，余將大半精力投入新創之京都義大利東方學研究所（ISEAS），憾此期間僅得偶暇致力於修訂。然余深感不可推卸之責任，完成增訂版，原因如下。首先，初版存有若干印刷錯誤及疏誤。其次，過去幾年來筆者蒐集到新史料，往年書中所論諸點，今吾見解多有更易。其核心文獻敦煌寫本 S.6502，過去視爲次要之諸問題，今之理解已發生根本改變。尤其是“大儀”，1976 年出版此書時，竟未識其真義。後來，余驚喜地發現，其意當爲“弘大之儀鐘”，本爲一天文高臺，緣其內置一觀測天穹之大型渾天球儀，故名“大儀”。此事至要，循此可蒐集證據證明筆者所認爲之世界上有記載之最早機械儀鐘，同時亦使余重新審視 S.6502 所有關乎明堂及其繁複建築形制與理念流變之記載（Forte 1988a）。S.6502 涉及明堂及其大儀之文字，需重新詮釋與疏證。本書修訂之所以必要，此僅一端。

此書舊版爲學者所引據，而筆者對相關問題之見解已有改變，於是愈覺修訂再版之責任迫切。最後是一實際之考量。至 1980 年代末，余個人舊版之頁邊空白已滿佈鉛筆注記，以致難覓空隙增添新注。此等注記多倉促寫就，且字跡漸次淡褪，筆者自己亦常難辨識。受威尼斯大學（Venice University）葛復朗（Franco Gatti）先生（ISEAS 首批漢學研究員之一）對新技術之熱忱所鼓動，余決意將該書掃描並妥爲編輯，以獲 [xii]
本書初版之電子副本，以自由修訂添補。葛復朗惠允爲余製作電子版，至 1994 年其人離任時，已完成大半。其餘部分祇得由筆者親力親爲；然

受工作日程及個人技能所限，進度緩慢。書稿終於備妥，遂得着手新版，終而有此大幅修訂與增補。

承蒙司馬虛（Michel Strickmann）、戴密微（Paul Demiéville）及狄庸（J. W. de Jong）對本書初版撰寫書評，筆者獲益良多。[1] 余於 1980 年發表一文，爲之增補與訂正，[2] 今悉併入本版。1984 年復應邀以日文發表一文，[3] 相關內容亦已採入。

本書之結構未加改動，唯於上編第一章增添“附錄 1.2:《大雲經》之梵文殘卷”，第二章則補入“第三節：懷義之史料”。

此外，爲便於讀者參詳所呈之史料，特於本版之末增加四節。

其一“《大雲經神皇授記義疏》所引已佚文獻”，列出 S.6502 所引諸書之題名，其中特標已佚之佛、道、儒諸典，全賴此本引文而全或部分得存。其二“史料校訂”，依時序列出須憑語文與史事考校之史料（如兩《唐書》《資治通鑑》等）。此節先據本書所用版本錄出原文，繼之依第一、二章所得結論訂正後之校文。蓋古今史學，往往視正史等官修之
[xiii] 典籍無可置疑，足資信受。惜事實不然，其中有種種偶然與意識形態之因，由此不復論述。今將原文與校文並列，意在強調必須以更可靠之資料及歷史脈絡驗核驗其可信性。其三“《大雲經疏》及其史學價值”乃未刊之文稿，本爲筆者 1992 年 5 月 11 日於法蘭西公學院講演稿。本文撮舉本書上編之要旨並揭《大雲經疏》史料之價值，並試將此疏定性爲傳統上之重要文類。其四爲首次排印敦煌寫本 S.6502 全本。雖未可成就真正之校勘本，然幸敦煌石室尚藏同文獻之另一寫卷，即大英圖書館編號 S.2658。是以將 S.6502 與 S.2658 對應部分合校，惟後者篇幅要短得多。

---

1 M. Strickmann, *The Eastern Buddhist*, N.S. X.1 (May 1977), pp. 156−160; P. Demiéville, *T'oung Pao* LXIV. 1−3 (1978), pp. 144−158; J. W. de Jong, *T'oung Pao* LXIV. 1−3 (1978), pp. 158−161.

2 “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 to my *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*”, *Annali dell'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* 40 (1980), pp. 163−175.

3 拙文《大雲經疏をめぐって》，收入牧田諦亮、福井文雅編《敦煌と中国仏教》（講座敦煌 7），大東出版社，東京，1984 年，第 173~206 頁。

此番校勘佐以語文學之辨析，遂得多處訂正，其中部分已見於 1976 年初版中 S.6502 之譯注。今則將彼時舊注悉數與新作語文學之考述並呈於此。

關於官制稱謂，1976 年之初版依據戴何都（Robert des Rotours）之名著 *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de l'armée traduits de la Nouvelle Histoire des T'ang (chap. XLVI–L)*（兩冊，1947~1948 年初刊，1974 年修訂）。今則已有賀凱（Charles O. Hucker）英文辭書問世（*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*, 1985），爲求便利，並方便於不諳戴何都所擬術語之人士，遂於本版改用賀凱英譯之名目。賀凱之書雖有其優長，戴何都之研究仍爲歐語世界中最完備、明晰之唐代官名彙編。

雖經多處增補與修訂，然筆者欲指出，關於敦煌文獻 S.6502 之性質、作者及其功能，現今基本保持本書初版之主要結論。今版所呈所論之新史料，悉皆確證初版之論旨。唯冀此新版較之舊版爲佳。

本版仍未能妥善論定一事，殊爲憾事，即《大雲經》事件主謀者之宗教面貌。1976 年余冒通行見解之不韙，指出 690 年進呈此政治與史事上至要之文書——傳統史家誤稱“僞大雲經”者——並非僞濫僧，而是 **[xiv]**
正規受戒、於官立寺院中成就事業之僧徒。且彼所呈之經本非僞撰，而乃一份高度意識形態化之文獻，此事覽 S.6502 即易知。此疏之真實性質即在於此，係當時佛門領袖所製之政治宣傳傑作（故有本書題名），以全力支持武曌（705 卒）以女身稱帝，爲之提供正統性之依據，蓋當時其在唐廷攝政之權力已遭質疑與挑戰；同時亦欲使佛教躍居政治舞臺之前列，並最終主導國政。

經疏撰述者乃一群被正史黜於暗角之人士，爲探求其義學背景及其派屬，余早在 1976 年曾試圖蒐集一切可得之史料。研究顯示，彼等皆爲正經僧徒，隸屬於官營寺院，皆奉純正之教，唯懷義一人爲例外。然此仍不足以解決其宗派背景之問題。筆者雖於 1974 年刊文論及玄範，自謂確信此僧爲瑜伽行師，著述甚豐（惜幾無存者），且其人即經疏作者之一。然至兩年後本書初版問世時，余對此問題已趨謹慎。今版雖仍保持

小心之態度，然能提出更多論據支持此說，此因名僧玄奘（664 卒）之學派大力支持武曌，並意欲假其手令佛教底定中國（見第二章末，頁 164 起）。此事並不奇怪，蓋瑜伽行派憑玄奘西遊之宏勢及其 645 年還京後與弟子之作爲，於當時正爲中國最強之宗派。

古今史家對武周（690~705）之敘述屢屢誤人，對此宜略陳數語。自 1976 年本書初版以來，余已表白對此之看法。更讓人驚訝者，史家敘述武曌稱帝之時期，多若待唐室猶存，而漠視周朝之建元。618 至 907 之唐代始終說，幾乎是通行觀念，由此稱其爲中國歷史上國祚最長之王朝。

[xv] 史家固然述及武曌，且不忘謂之爲中國史上空前絕後之女帝。然而，並非所有史家皆說明其所主政者並非大唐，而另立國號“大周”。何以既謂之爲中國唯一女帝，卻又輕忽甚至否認其周朝之正統？此等中國傳統史學之偏見，吾儕不可苟從。顯然唐朝絕非自 618 年而直貫 907 年；謂之長命王朝，純屬妄談。令人意外者，此一觀念常被輕率認作史實。首先，618 年唐室並未掌控帝國全境。彼時諸方皆擁兵自立，爭逐天下之勢尚在。數年後，李唐方始剋勝眾敵。此外，690 年 10 月 16 日（天授元年九月九日）洛陽宣告建立周朝，唐之國號已被廢止，此事未受應有之認可。此武周王朝遂堅控一遼闊之帝國逾十四載，至 705 年 3 月 3 日（神龍元年二月四日）始告結束。其間之文獻與豐富金石資料，皆清楚證明當時普遍認爲唐朝業已覆滅。及至 705 年，唐由政變復辟。雖宗室仍爲原李氏家族，然已大異於 690 年宣告終結之舊唐。且應注意，復唐不久，於數十年內即陷入深重危機。實則於 756 年 2 月 5 日（天寶十五載年正月初一），復於洛陽宣告成立大燕朝，其所把控者，乃帝國之大疆域，嚴重威脅李唐基業，直至 762 年 11 月方始消弭。近七年間，中國實有二朝並立爭鼎。撇開整個 618 至 907 年間諸多並立政權之問題（大燕非最後者），筆者以爲欲重立健全之史觀，不可復將武曌簡化爲唐室之僭主，否則凡創新朝者皆可謂篡奪者。且當知，終其武曌所建之大周，並無人建號挑戰其權威。故論及王朝，當將全期分爲三段：前唐（618~690）、武

周（690~705）、後唐（705~907）。

筆者不認同某些史家，將武曌之崛起及登極僅歸結於其個人權利慾。當反思者，一女子於其病夫、帝王李治在世時，殷勤輔佐其大業；及其 **[xvi]**
683 年末崩逝後，身爲唐室太后，或無意於廢唐，何以七年後復決意創建新朝？彼時唐廷定有一眾政治菁英，深欲延續初唐幾朝君主之政策，同時亦有志保全武曌之統治爲之保障。《大雲經疏》明確指出，武曌乃初唐三帝之真正傳承者；且又顯示，至“武周革命”前約兩月，仍屢次保證賡續唐室。

不可否認，周朝之創立對各領域皆注入一股異常蓬勃之生機。武曌以擅於擢拔賢能、置諸要職而著稱於史。其主政時期被視爲中國史上最繁盛輝煌之幾大世代之一，亦最爲開放，對外來者與外來影響最具包容性；此時期於今吉爾吉斯境內設置安西四鎮（龜茲、于闐、疏勒〔Kashgar〕、碎葉〔Tokmak〕），由此帝國於中亞復奪控制（事自 692 年 12 月 8 日）。楚水南岸、碎葉西南約 8 公里貝希姆（Ak Beshim），考古發現一座“大雲寺”遺址，其名正源自本書所論之《大雲經》。在科學與技術領域讀者僅需存記兩事便已足矣，即機械儀鐘與印刷術兩大發明足令史家考索。若執意維持所謂 618 至 907 之不間斷之唐代觀，則須弔詭地承認，“唐”朝最爲光華燦爛之時期正爲“周”代。

誠然，欲擺脫傳統史學對武曌時期之偏見並不容易。然筆者敢言，此事並非不可爲，尤賴正確解讀 7 世紀末與 8 世紀之各類史料（碑志及其他），兼及現代考古日益豐富之新獲。吾儕當謹慎研治此等史料，並試以無偏之心智加以詮釋。

富安敦

羅馬，2003 年 9 月